

陈元赞的事迹及其著作 在日本的流传

袁尔钜

—

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朱之瑜，在抗清失败后，曾流亡日本二十多年。他在日流寓期间，“与日本学者广泛地探讨各种学术文化问题，并招收学生，讲授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两国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。”（朱谦之：《朱舜水集·前言》）但是在日本流亡三十余年，与朱之瑜同样直至老死于日本，对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有着多方面重大贡献的陈元赞却鲜为人知，学术界对他在日本的作用和影响还少有介绍，对收集和研究其著作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^①。

陈元赞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诗人、学者和方技家。从十七世纪中叶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以来，他的事迹和著作广为流传，无论是在学术思想还是在文化等方面，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对中日文化交流曾做出重大贡献，在日本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
陈元赞在日本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学者。日本学者原念斋撰《先哲丛谈》，把陈元赞、朱舜水与日本著名学者藤原惺窝、伊藤仁斋、荻生徂徕、林罗山等并列为日本的“先哲”，把陈元赞的著作视为日本的珍贵文化遗产。日本记载陈元赞生平事迹的著作甚多。近年来，日本学者小松原涛又出版了《陈元赞研

究》（日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，昭和四十七年），对陈氏作了系统地探讨。

陈元赞字义都，号既白山人，别署菊秀轩、芝山、升庵、虎魄道人、崆峒子等。生于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卒于日本宽文十一年（清康熙十年，1671）。在许多题款中自署大明武林或虎林人，以示不忘故国。陈元赞的身世、家世，目前已难详知，他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说《简斋集》是他“太太爷爷”所著，简斋是其“先祖”，即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陈与义（1090—1138）。又从日本学者林罗山（1583—1657）《与大明人沈茂人》书信中可知，陈元赞曾与沈茂人在明天启元年，同为福建总兵使节单凤翔的随行译员渡日商讨倭寇事，由于江户幕府不与地方政权开议，遂归。陈元赞何时去日定居，至今说法不一^②。从他在《元元唱和集》中的《对月思乡》诗中，有“鸿雁不传乡国恨，杵砧长动旅魂惊”句看，似在明亡后不愿臣仕清朝而逃到日本的。而日人山边松在日本元禄辛未年（康熙三十年，1691）校辑《升庵诗话》后跋中载，陈元赞“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长崎，患痢日久，腰钞皆空，卒不得还。”则知陈元赞在明朝时科场运乖，从科举步入仕途未曾走通。原念斋在《先哲丛谈》中，说他是明“崇禎进士”，这与称朱之瑜为进士一样，是当时日本人对流寓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的尊称。遍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》，并无陈元赞其名。实际上，他不但不是进士，也未曾为举人、秀才。又据小松原涛在《陈元赞研究》中考定，陈元赞在二十七、八岁时，曾游学河南嵩山少林寺，在此时学到了拳法和各种技艺。

以上就现存材料所知陈元赞在国内的一些情况。他流寓日本后，所知其事迹略详。姚文栋在《陈元赞先生事略》中说：

陈先生元赞字义都，明季人，避乱至日本，其事迹不详。或云生于万历十五年，或云崇禎进士，应尾张侯聘，居

古名屋，时，往来山城江户与诸名流为文字交。万治二年，始与僧元政相识。元政善诗，先生语以《袁中郎集》，元政因尊奉之，一时摹拟，遂成风。尝合刊二人诗曰《元元唱和集》（见姚文栋：《读海外奇书杂著》）。

陈家麟在《东槎见闻录》中说：

陈元赞字义都，号既白山人，一字升甫，又称升庵，浙江虎林人。明万历十五年生，因避乱来日本，征至尾张。（见《尾张所会册》）万治二年与名古屋僧元政最契，生平所酬者汇为《元元唱和集》行世。又著《升庵诗话》若干卷。能嫻邦语，兼善拳法。日本之有拳技，闻自元赞始事。（原注：见《先哲丛谈》）。余曾见其墨迹，内书自作，题诸楼诗数首，字法瘦劲，至今日人犹争宝之。

王韬在《扶桑游记》中说：

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，在水户则朱舜水也，在尾张则陈元赞也，在纪伊则戴曼公也。

姚文栋、陈家麟、王韬都是清末人。这大概是国人最早记载陈元赞的文字。

再看日本学者的记载，木宫泰彦说：

与朱舜水同时来日本而仕于尾张德川侯者，有陈元赞（字义都，号芝山，又号升庵）。其来日时，携来明袁宏道之《袁中郎集》，传于僧元政，影响于日本诗文学者最多。元政在日本鼓吹性灵派之诗文，实基于此。元赞元政平生皆唱和之作，有《元元唱和集》。元赞又创安南式之元赞窑，颇有雅致。又传拳法于浪士三浦与次右卫门，矶贝次郎左卫门，福野七郎右卫门等。在日本制陶史与柔道发达史上，亦不可忽视之人也。（《中日交通史》，陈捷译，又见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商务印书馆1980年，陈锡年译）

木宫泰彦在这里除提到诗文、拳法外，又提到陈元赞在

日本推广制陶术。

中村新太郎在所著《日中两千年——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》（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）中，除肯定是日本拳术所谓“起倒柔术”的发端者外，又说“陈元赞还擅长诗文和医学，因此不久就应召前往尾张，做了德川义直的医臣。”

清人姚文栋、陈家麟、王韬以及日人木宫泰彦、中村新太郎诸人所记，与日本最早记载的《先哲丛谈》是一致的。

元赞不详其履历，盖生于明万历十五年，崇禎进士，弗第。及其国乱，逃来此邦，遂应征至尾张，乃后时时入京，又来江戸，与诸名人为文字交。初，万治二年于名古屋城中，与僧元政始相识，契分尤厚，其平生所唱酬者，汇为《元元唱和集》，刊行于世。元政诗文慕袁中郎，此邦奉中郎，盖以元政为首，而政本因元赞知有中郎也。元政书曰：“数日前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，乐府妙绝，不可复言，《广庄》诸篇识地高，《瓶史》风流，可见其人，又赤牒之中，言佛法者，其见最正，余颇爱之，因足下之赐也。”

.....

元赞善拳法，当时世未有此技，元赞创传之，故此邦拳法以元赞为开祖矣。…（国正）寺昔多藏元赞笔迹，罹灾，今皆乌有云。

除文学、拳法外，陈元赞在日本还曾从事多方面文化技艺的传播，据小松原涛在《陈元赞研究》中列举事实，还在音韵学、绘画、建筑、书法、医药、典章制度等方面造诣很深，特别是制陶和茶道，至今影响未泯。制陶当时就有“元赞烧”专称。说“茶家多俗流，制茶器多俗人，唯元赞为雅矣，如其手造之器，则当为茶具之上品。”当时，“陈氏茶道”风行一时，与“元赞烧”密切联系在一起。

除上述诸贡献外，原念斋等未提到的是，陈元赞作为学者，

还有许多著作在日本流传，对日本学术界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

二

陈元赞有许多著作，有的已经亡佚，现保存在日本的仍有不少。下面分别作一介绍。

《元元唱和集》是陈元赞和日僧元政合著之诗文集，各取一“元”字为书名。初刻于日本宽文三年（1663）。我国未见有刊本。全集均为汉文古体诗，分前后两部，前部为《元赞诗》，有元政题序。后部为《元政诗》，有陈元赞隶书序。集中有四言、五言、七言律绝体诗二百余首。二人步韵诗，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、文化交融的真实记录和历史见证。元政（1623—1668）俗名石井吉兵卫，京都人，二十六岁为日莲宗僧，比陈元赞小三十六岁，尊陈元赞为“老人”；陈元赞视元政为“忘形交”。元政慕公安派诗文，赞颂袁宏道诗文“灵心巧发，不藉古人，自为诗为文”。对袁宏道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（《叙小修诗》）的文学主张极为钦佩。袁中郎诗经陈元赞、元政介绍到日本后，在日本文学史上起过重大作用。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，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也影响了日本，获生徂徕是当时著名学者，才学声望均高。他提倡古文，“天下翕然向之，遂至风靡一世。”

“明代排击李（梦阳）王（世贞）的有袁宏道，北山也借来攻击徂徕派。”（《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》，华北编译局1941年版）北山即山本北山，名信有，是元政后日本著名的追踪公安派的文学家。他与井上纯卿、村濑通熙、桎田伯恒等“皆慕中郎风”（《陈元赞研究》）。他们都以公安派文学主张为理论武器，在日本反对文学复古。《元元唱和集》是一部袁宏道以后中日两国诗人合作的公安派诗文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值得重印和研究。

《爱莲说》有前后两篇，大约著于日本宽文二年。文中体现了陈元赞老庄思想，是研究陈元赞思想可参考的材料。陈元赞

在文中说，莲的种类很多，他为什么独喜红莲与白莲呢？因为“白者以香胜，红者以艳胜。白者自白，不由水之濯而白；红者自红，不由日之炙而红。”“香者自香，不因人之臭而香；艳者自艳，不因人之观而艳。”它能“使人眼根之净焉”，能“使人鼻根之空焉”。总之，它是不“媚世希宠者”。这明显地透露了他的思想倾向和存志高洁。

《长门国志》 又名《荻津长门国志》，著于日本元和九年。长门，系日本旧藩国，即今之宫崎。书前有清光绪浙东人王治本题诗：“喜是同文气谊连，载将游笔纪山川。修成一卷长州志，传到于今三百年。”《长门国志》一书，记述了当时长门国都、风土、民俗、太守、氏族世代源流、仪表、德行实录、行履事迹及总论七节。类似中国的地方志体。

《升庵诗话》 著于日本元禄四年（1692）。陈家麟说《升庵诗话》若干卷。误。实为手抄本一卷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有藏本。书中自称“余杭州人”。提到：“仆（陈元赞自称）二十四五时（按：实为三十四五）遇李文长（朝鲜学者）于京师（日本京都）。文长垂八十，仆作诗十，文长二”。又在回答何以号“虎魄道人”问时说：“文长遗吾虎魄枕，吾甚爱之，故以为号。”又称《简斋集》是“我太太爷爷的”，“曩祖简斋府君”。书中不承认陈与义诗佳，而特别推崇袁中郎，说是明人诗“最佳”者。日人山边松在陈元赞去世后二十年（日本永禄三十年）后，在校辑《升庵诗话》后跋中提到，《诗话》“六十六件，明人陈元赞之言也。元赞杭州既白山人，字羲甫，号崆峒子，又号虎魄道人，一字士升甫，又号升庵。

《老子经通考》 著于宽文十年（1670），是陈元赞去世前一年完成的著作。属晚年学术理论著作。据他在序文中说，书的取名，是因为“初学为欲求多解者，录于评论附注后，因题曰《老子经通考》”。《老子经通考》以河上公章句为基础，采录汉晋

唐宋元明以来二十多家注，其中引录最多的是明人焦竑的《老子翼》，以下依次为严君平，苏辙、林希逸、李息斋、吕惠卿、王安石、王弼、钟会等。对以上诸家之注解，陈元赞多持批评态度，说“注家虽几千百，犹不证实理”，或指责其“疏”，或指责其“难通”。“非老子本旨”，“而失实理”。独尊《河上公章句》，说“阅河上公章句而用希逸口义，是则非庸士理学之昏昧乎？”可见，陈元赞不满意诸家注，在于不证实理。特别指斥宋以后俗儒庸士用理学观点解释《老子》是“昏昧”之言。他说的“实理”，即是“以为道者，人伦之实理；名者，人间闻达之实名也。”

本书前有陈元赞序文和葛洪的《老子经序》及陈氏对之注解。正文按《河上公章句》分上经下经，共八十一章，约十二万字。上经称《老子道经》，分“上之本”和“上之末”二卷，共三十七章；下经称《老子德经》，分“下之本”和“下之末”二卷，共四十四章。在《体道第一》下注：“此题河上公所书也，希逸改为《道可道》章。希逸以无为本，河上公以实理名题，皆仿此。”陈元赞赞成以“实理名题”，在全书注解中，他突出“实理”二字，反对“以无为本”。此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日刻本。

以上诸著作，现今皆有传本，是我们研究陈元赞及其思想的重要材料。除外，从一些著作中提到的还有《珊瑚枕》，编于明万历年间。这是他在自己祖国编辑的唯一著作。据他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说：“仆有《珊瑚枕》一卷，少小时所辑也，后为人所窃，今老矣，不能。”又亡佚的著作还有《双星稿》、《既白山人集》和《虎林诗文集》。成书年代不详，亡佚原因或是陈元赞的著作，多藏于国正寺，后罹火灾而化为灰烬。另外，现在日本还有陈元赞一些题跋、序文、铭文以及赠友诗，均散见各处，有待汇辑。

三

从陈元赞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情况可以看到，他对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到日本，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的贡献。正如日本当代学者米山寅太郎所说“陈元赞对于我国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”（《陈元赞研究序》）。这可说是恰当地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。且不论他在制陶、茶道、书法、医药等方面的贡献。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，他在日本最少是三个方面的首创者。

首先是把中国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者。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，是在反对文学复古中产生的文学革新派。他们主张的性灵文学，根源于李贽的《童心说》。李贽主张“童心自文”，直抒性情，体现真挚之感情。这具有反传统的进步意义。朱之瑜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过重大贡献，他重实理实学，对诗文却带偏见，认为“无益于身心”，“无益于民风世教”（《朱舜水集》，第382页）。所以在日本时，绝少谈论诗文，对公安派文学也不甚赞成。事实上，公安派文学在日本也曾发生过重大影响。陈元赞在这方面正好弥补了朱之瑜之不足。

其次是首先把中国少林拳术传播到日本者。在陈元赞东渡前，日本固然已有拳法，陈元赞融合中国少林拳法，明朝衙役捕人术以及日本固有拳术，“加以变通损益，创造了柔术（又名柔道），这一驰名体坛的运动项目，…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列柔术为比赛项目，足见中国拳术绪余的柔术影响之大。”（周西宽文，见《成都体育学院》1979年第1期）在这一意义上，陈元赞可以称为日本柔道的开祖。

再次是首先系统地把《老子·河上公章句》介绍到日本者。在明治维新以前，日本学术界思想，一直受儒家影响，朱子学和阳明学虽然交迭兴衰，而仍为唯心论居支配地位。既无道家思想影响，也谈不上唯物论思想的传播。《老子》一书，历来注家不

下数百种，但不外以王弼为代表和以河上公章句为代表的两派，前者是以十足的唯心论观点解释《老子》，后者则有某些唯物论倾向，这是公认的。陈元赞著《老子经通考》，系统地介绍《河上公章句》，这无异是对儒家在日本的支配地位的挑战。这对传播古代唯物论思想，动摇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地位是有作用的，应予肯定^③。

我们这样说，并非认陈元赞是唯物论者。陈元赞在学术思想方面固然有某些唯物论因素，但其主导的是老庄思想，从他某些诗词和与朱之瑜交往中可以得到证明。陈元赞与朱之瑜先后流寓日本，是日本人公认有造诣的学者。本来胜国逋臣，流落异国，又是浙江同乡，应格外亲切。但二人来往并不十分密切。中华书局现编辑出版的《朱舜水集》中，除一则《答陈元赞书》外，别无其他文字，相形之下，显得很冷淡。

弟浅衷薄植，无足比数。至此亦惟闭门扫迹，不为屑屑往来。如何村翁之贤，亦未尝识荆，乃叨谬爱，涓日宠招？虽愧不敢承，然台台屡道其诚，又不敢固辞以自外。至日即当趋候，惟天雨著屐，即不能耳。昨枉顾，以急于言旋，疏慢殊甚，深用为愧！先此奉复，诸容晤罄，不宣。（《朱舜水集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，第54页）

朱舜水的书信，写得相当客气，语言辞气上显得生疏冷淡。而且以后又未见有书信往来。在《朱舜水集》中，也有一些祭文。陈元赞早朱之瑜十一年去世，在《朱舜水集》中却看不见为之写祭文，这也是出乎常情的。梁启超根据朱之瑜《与安东守约书》中说“不佞与颖川齟齬”（同上书，第162页），疑与此齟齬者“或是陈元赞”。据日人木宫泰彦《中日交通史》，颖川系指浙江金华人陈明德。他于日本庆安年间渡日后，以医术维持生活，在日本改名颖川入德。

那末，朱之瑜为什么与陈元赞交往不密切呢？这从二人的思

想情趣不甚相同可以得到解释。朱之瑜既反对程朱理学脱离实际，又批判王守仁心学“杂佛书语”。自己主张“经邦弘化，康济艰难”的“实理实学”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。基本是儒家用世思想。陈元赞则耽悦老庄，有点出世忘情。“我不避秦惟避俗，山居不问水流花。”（《元元唱和集·偶作》）正是这种感情的流露。他所著的《老子经通考》，批判俗儒庸士，也表明他的道家观点。

在与朱之瑜对比中，我们也看到了陈元赞的历史地位，为此，无论是哲学、文学、医学、武术以及工艺等方面，注意收集整理陈元赞生平事迹及其著作很有必要。让这位“久居”日本的方技家、诗人和学者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来。

注：

①1941年有梁盛志在《中和》杂志2卷11期撰有《记陈元赞》一文，这大概是继梁启超之后较早研究陈元赞之文章。

②齐思和等编《中外历史年表》中载：“1659年，清顺治十六年，日本万治二年，明人朱之瑜、陈元赞来归。”按1659年为朱之瑜定居日本时间。陈元赞是否于此年定居日本，说法不一。

③参见拙文：《陈元赞及其〈老子经通考〉》，载《浙江学刊》1986年第1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